

# 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城镇发展与新社会阶层青年的互构困境和进路省思

■ 杜娟 杨宏杰

(西南民族大学:团委;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摘要】** 本文通过对新社会阶层青年在小城镇的融入困境与进路进行深入研究,发现新社会阶层青年在融入小城镇发展的过程中,既找到了自己成长的契机和发展的归属,又面临着社会融入带来的压力焦虑、期望落差下的徘徊顿感、转型阵痛中的迷惘与彷徨等互构困境。根据上述发现提出了实现小城镇振兴与新社会阶层青年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小城镇 新社会阶层青年 乡村振兴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1.03.013

## 一、研究背景

小城镇是城市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伴随着交通和信息通讯的发展,作为联通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小城镇融合发展态势日趋显现,无疑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将会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让人口流动变得不再困难,在云南大理也涌现出一批新社会阶层青年。其中,“新农人”结合“互联网+现代农业”构筑了生产、经营、体验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旅居者”从自身做起保护山水湖草,致力于田园风光的保护,推动旅游业蓬勃发展;独立音乐人、乐队主唱、手工艺者、背包画家、新媒体人等新社会阶层青年人士置身于培育人才、丰富活动、传承文化的振兴中,不仅带旺了人气、振兴了文化、盘活了产业、丰富了生活,成为小城镇发展的示范性样本,也是研究小城镇中新社会阶层青年发展的独特范例。置身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新社会阶层青年在流浪中寻找归属,在受到外界广泛的关注和内心自我发展间出现矛盾的同时,也引发了如何平衡小城镇文化与经济、保护与发展的探讨。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 (一)文献综述

小城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城乡连结的纽带,是沟通城市与乡村的桥梁<sup>[1]</sup>。在小城镇

收稿日期:2021-03-01

作者简介:杜娟,西南民族大学团委,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青年工作;  
杨宏杰,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族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思政课专项“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五个认同’思想教育基本经验及创新机理研究”(课题编号:19VSZ1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发展的过程中,张琛等人提出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视作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sup>[2]</sup>,而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以人为核心,以生态文明为红线,以集约、绿色、低碳、智慧为发展方式的可持续的城镇化<sup>[3]</sup>。因此,如何通过小城镇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人才显得尤为关键。全面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等目标,人才成为主要支柱,尤其是青年人才<sup>[4]</sup>。

青年是当下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也是流动人口的中坚力量。他们在空间范围流动,形成了新社会阶层青年,其独特性、代表性日益彰显。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新社会阶层大致属于体制外的中间阶层,职业流动性较强,其快速崛起不仅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也推动着我国的社会向“橄榄型”社会结构模式过渡<sup>[5]</sup>。中共中央在2021年1月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指出,新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sup>[6]</sup>。朱健刚也认为新社会阶层群体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分化出来,主要以“80后”“90后”和“00后”群体为主<sup>[7]</sup>。在对新社会阶层群体的特征进行分析之后,李强认为新的社会阶层是党在新时期必须团结的和可以信赖的社会力量<sup>[8]</sup>。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在大理工作生活的15-45岁的新社会阶层青年,包含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

作为新社会阶层青年,如何有效参与到小城镇的发展建设当中是当下公民参与的重要议题。对于青年的社会融入与治理参与,徐鹏等人认为流动青年的社会融入是一种多维度、非同质化的发展过程,它导致了流动青年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呈现出异质性的融入样态<sup>[9]</sup>。王成龙等人通过对返乡青年洄游的研究,发现由于在返乡之前有着丰富的大都市生活经验,导致了他们回到小镇后产生了城乡价值观念的差异甚至是冲突<sup>[10]</sup>。面对青年的社会融入问题,王道勋等人认为应对青年进行持续的引导、培养和锻炼,通过建立参与治理体系,畅通参与表达渠道,从而提高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sup>[11]</sup>。杨菊华提出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又需要消除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sup>[12]</sup>。此外,何怡萱等人还提出政府应从就业培训、公共物品均等化和舆论引导方面促进青年流动人口、本地居民、城市本身三者更好融合,实现持续稳定发展<sup>[13]</sup>。谢素军发现由于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的时代性特征,他们追求自身价值的同时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sup>[14]</sup>。因此,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若能将自身发展与当地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发挥自身正向价值与活力,这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sup>[15]</sup>、创新“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社会治理水平<sup>[16]</sup>、“构建有序有效的矛盾预警、利益诉求表达、协商沟通、救济救助机制”<sup>[17]</sup>起到重要作用。

## (二)研究方法 with 样本

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方法,选取2018-2020年在小城镇大理的新社会阶层各行业75名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调查样本中,13人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个体经营户有55人,其中12人从事教育培训行业,43人为旅游服务行业;其余7人为民营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本文的研究样本主要是“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新农人”、助推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旅居者”,其中,最多的是独立音乐人、乐队主唱、手工艺者、背包画家等自由职业者和新媒体从业人员。根据新修订的《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所调查样本均为其中所指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此外,在样本中选取了12个来自不同行业的典型样本,如表1所示(见下页),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方式跟踪回访和深度访谈。

文章采用MSQ量表,请受访者从经济收入、工作稳定性及前景、职业声望、生活环境、社会保障、社会融入等维度进行评分,分值为5-1分,依次代表非常满意至非常不满意,以此从生活方式、职业发展、社会认同等多个方面立体审视小城镇新社会阶层青年的思想动态、发展路径,以期

揭示现象背后隐喻的社会变革进程,通过小样本折射新社会阶层青年发展状况,为乡村振兴提供进路省思。

表1 部分受访者信息

编码	性别	年龄	原居住地	现从事行业
KK-M-201808	女	38	北京	自媒体
XF-M-201901	女	34	北京	法律/绘画
DSK-F-201908	男	43	大理	旅游产品开发
SY-M-201901	女	33	南京	书店
LJK-F-201909	男	45	上海	客栈
TXK-F-202006	男	36	北京	旅游策划
LYY-M-201909	女	39	杭州	农业/旅游
LG-F-202001	男	35	北京	客栈
DY-F-202009	男	28	大理	客栈
YLN-M-202009	女	32	成都	休闲旅游/新媒体
TK-F-202001	男	42	武汉	教育

### 三、研究发现

#### (一)新社会阶层青年在小城镇的融入和互动

研究发现,新社会阶层青年在融入及互动过程中主人翁视角凸显,也彰显了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匹配,由个体多向发展的弱关联变为具有较强时效性、影响性、地域性的强连接。根据Thibaut和Kelley提出的社会互动理论和人际互倚理论<sup>[18]</sup>,新社会阶层青年的融入和互动以及互动中的行为和方式,都会对小城镇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分析发现,除了工作、环境、家庭因素,更多新社会阶层青年考虑将个人兴趣与职业相结合,考虑个人情感与时间自由的匹配,由体制内向体制外转向,由传统职业向新的社会阶层转向。

在社会融入的研究中,主要选取了样本中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两类具有代表性的新社会阶层青年进行比对。研究发现,青年人占主体、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较高行业从业水平,不同行业之间社会融入度有区别,同时对小城镇期许与支持的要求也不同。从社会融入度来看,新媒体从业人员因其职业性质在融入时显得更加自然主动,自由职业者多由空间转换实现社会融入。自由职业者拥有更高的角色转换度和更强烈的归属感,因此,对小城镇期许与支持的要求比新媒体从业人员更高。同时,多元的自我情感认知需求、个体职业预期和社会价值取向为小城镇新社会阶层青年构建了内外环境和社会融入空间。

#### 1.新媒体从业人员:主动融入后的价值彰显

研究发现,很多在小城镇的新媒体从业人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半在大城市有较好的职业发展机会或拥有一技之长。例如被访者KK-M-201808,38岁,以前是媒体人,“5+2,白加黑

是家常便饭,后来自己出来创业到上海做广告公司。”在当下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职业发展与家庭联系之间及身体心理的双重压力,使得他们开始思考个人发展规划,这也是大部分新社会阶层青年主动融入小城镇的原因。被访者KK-M-201808说:“现在自己经营公众号,做微店也有很好的收入,女儿在这里健康开心,父母还有康养空间。”相比于传统行业,新媒体从业人员由于相关从业经历在小城镇中的自然融入度较高,他们的融入不仅是融入当地的生活,还体现在主动承担起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使命,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在互动论视野下<sup>[19]</sup>,小城镇场域中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更容易从关注自身融入的主体视角转换成关注身边人的附属,视角寻找融入的方向和破题的坐标。

## 2.自由职业者:融入后的传承拓展

网络的普及和发展让自由职业者得以解开有形的“桎梏”成为身兼数职的“斜杠青年”,技术的变革让新社会阶层青年可以轻松实现空间转移,他们的融入为小城镇的发展和振兴注入了丰富的元素。作为本地人,被访者DSK-F-201908表示“对民族文化遗产和推广责无旁贷”,并在政府的帮助下,打造了白族民居里的博物馆,通过开班传承手工艺,还给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从返乡创业的洄游青年到旅游产品研发者,从阔别已久的异乡人到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角色的转换与建构让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也让新社会阶层青年找到了归属。在受访的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中,很多自由职业者都选择了旅游服务行业,他们的融入也为当地的旅游产业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新的力量,不仅传承了文化,也契合了市场发展的新趋势。被访者YLN-M-202009致力于开发民族文旅产品,现在她专注于对扎染图谱模版的挖掘保护和整理,她说:“把技艺展示和体验升级推向旅游市场,同时为学校实地教学提供场地,把这份千年技艺保护好。”

包容淳朴的小城镇通过对新社会阶层青年赋权赋能,不仅帮助个体找到了自我发展的方向,增强了其归属感和幸福感等心理体验,也为其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体间交流提供了沃土。

## (二)小城镇发展与新社会阶层青年的互构困境

新社会阶层青年为了满足生活生产需要与小城镇的个人、群体在经济、文化、政治、心理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互作用。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在小城镇的感情关系、地位关系、利益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 1.“家空间”的“固着性”和“流动性”之间的矛盾

“家”作为人类日常活动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情感和社会文化资源。Despres认为对个体而言,“家”具有具象化意义和抽象意义<sup>[20]</sup>。对于来到小城镇的新社会阶层青年,一方面,“家”的居住空间是他们栖息的地方,是符号化的精神归属地,是固着在青年意识深处唯一可以落脚的“根据地”,这重燃了新社会阶层青年对小镇生活的期待和憧憬。被访者DY-F-202009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洄游青年”,他说:“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还是得为家乡做点事。”但另一方面,在许多民宿中,游客广泛参与到这些青年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具有典型的“流动性”特质。被访者DY-F-202009将家里的小院改造成民宿,但受到资金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投资收益不成正比,不免灰心地说道:“家里人对我之前的辞职也开始表现出不理解,我还不如回原来的城市,自己干什么都好。”“私密空间”被“公共空间”侵蚀和“聚少离多”的相处模式影响了新社会阶层青年创业的积极性,这让他们在阔别故土数年之后的重新融入变得更困难。

### 2.“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

对于逃离大城市的新社会阶层青年嵌入小城镇之后,其日常活动空间较之前呈现出了一种收缩特征。由于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的限制,青年在迁入的初始阶段适应难度较

大,加上来自迁入地的社会和文化排斥,他们大多选择将社会活动空间固定在特定的范围,社交对象与社会支持主要来自其生活的区域。但是,这些社交对象与之前在大城市里的交往对象有所不同,他们具有显著的异质特征。被访者 LYY-M-201909 原来是做现代农业的,来到小城镇后原以为可以按照欧洲的样本做特色庄园,但是投资后才发现,设计建造成本较高,土地租用等环节也受政策波动影响,最后只能把现代农庄计划做成了农家乐。空间位置的转换并不能抵消工作生活的压力,“流浪”的背后隐藏着难以融入的苦恼和身份认同之间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偏差不断被诗和远方放大,因现实被迫转型的冲突和阵痛让新社会阶层青年开始迷惘彷徨。

### 3.“精英”身份与发展资源缺失之间的矛盾

不同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不会直接创造价值,但可以促成其他形式资本的相互转化。来自北京的被访者 LG-F-202001 之前从事金融行业,去大理旅游后决定在大理置业创业。“当时的双廊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因为房源少,投资前两年生意很不错。”新社会阶层青年们倾向于在两个网络中都建立有效联系,以获取来自两个世界的资源与信息。在迁至小城镇之后,原有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社会精英的社会关系等资源虽能在初期为青年们提供心理慰藉,但生存环境异质化的本质又往往让他们在发展中陷入低效率的“陷阱”,对美好生活的依恋、向往与当下生活的失重和无力,浸入交织而产生乏力和困顿。被访者 LG-F-202001 近千万的投资让他不得不卖掉房产,可现在北京房价一路高涨,民宿的收益却一年不如一年,又碰上最严环保令和疫情,“也不是都如大家所看到的都是诗和远方”。

## 四、新社会阶层青年反哺小城镇发展的路径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社会阶层青年通过不断冲突、适应、同化的蝶变推动小城镇的振兴和繁荣,同时小城镇的转型和重构也为新社会阶层青年带来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依托社会互动情景、方式和规则的变革,这种双向互构催生出个人与小城镇发展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动态交互引发了青年对小城镇发展的在地实践,外在表征有语言服饰、工作状态等,内在表征有认知思维、价值逻辑、生活观念等。生活、工作、学习的多重场景并置,增加了青年发展的交互性聚合、融入与实践。新社会阶层青年如何能在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小城镇振兴进行反哺显得尤为关键。

转变观念,关注动态诉求,不断提升引领服务新社会阶层青年水平。小城镇的治理体系还无法全面覆盖新社会阶层青年,这就决定了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使得这个群体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度不高。做好新社会阶层青年的引领服务工作需要转变观念,用服务水平、认同感的提升来吸纳整合。社会组织人员可以在公共领域服务小镇居民,新媒体从业人员可为小镇故事和治理进行传播和监督。与此同时,政府要主动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思想动态,不断提升引领服务新社会阶层青年的水平。

强化保障,认识群体特征,主动帮助新社会阶层青年适应融入。新社会阶层青年在小城镇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以血缘、地缘、业缘或趣缘为主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群。大部分人都表现出角色失调的困惑,或针对角色分化后一人承担多种角色产生的冲突,或由于个人后职业生涯目标不明晰、规划路径极具变化带来的角色不清、角色中断等。政府和相关机构要主动作为、强化保障,弱化其对小城镇的疏离感。针对收入差距大、群体内差异化加大趋势,要高度关注利益分化、价值观多元对各群体可能产生的冲突。判断并厘清新社会阶层青年在小城镇的角色关系、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更要深刻认识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的特征,给予更多的发展

机会和空间,更好地帮助他们适应融入。

创新机制,加大宣传教育,不断促进新社会阶层青年参与生态保护治理。参照海曼提出的参照群体论<sup>[21]</sup>,生态振兴不仅是小城镇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关切,更是新社会阶层青年作为个体将小城镇对环保的期待与价值规范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双向调试。在对MSQ量表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后,不难看出受访者对在小城镇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融入等方面满意度高,对工作前景、经济收入的满意度适中,而对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障及职业声望等的满意度低。因此,要加大宣传,不断唤醒新社会阶层青年的生态意识,引导他们主动地参与到当地生态环保的浪潮中去。要创新机制,引导他们正视发展过程带来的转型阵痛,客观认识政策调整、长效机制建立的周期性,理解支持生态保护的相关举措,合理合法反映生产经营诉求。

搭建平台,开展培训交流,不断培育振兴小城镇的人才新动能。新社会阶层青年作为融入至小城镇的人力资本,因其溢出效应将在投入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促进自我发展。对高质量的生活需求与资源滞后的社会供给,新社会阶层青年要转变观念,利用自身知识和服务的转化刺激小城镇产业规模效应的集群,从而吸引资本、带动人口集聚。政府应引导新农人和新旅居者推动小城镇新农业、旅游业的转型,组织社会组织参与当地教育培训,带动当地文化产业的兴旺发展。培育一批有较高素养的劳动者,小城镇人才资源优势 and 成本优势才能不断凸显,成为振兴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新社会阶层青年为小镇提供了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扩大了投资,增强了市场需求,带动了当地就业;另一方面,他们在原有行业和城市工作中积累的经济、社会、专业资源,会成为小城镇发展的载体和其链接大城市发展的纽带,可以丰富产业业态、创新社会治理,为小镇振兴提供人才新动能。

深度融合,做好监督管理,引导新社会阶层青年投身文化振兴。伴随着交通、通信的迅猛发展,社会互动媒介及其方式产生了深刻变革,这使得社会互动的规则伴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发生改变。在小城镇生活工作的新社会阶层青年,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可以实现跨地域、跨时空的即时互动,让“身体缺场”的互动取代“身体在场”。新社会阶层青年与网络接触频繁,尤其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意见领袖、网络主播等更是社会思潮的放大镜,具有引领价值话语和舆论的功能。小城镇的新社会阶层青年非常看重自己的发声带来的他者认同,当小城镇出现环保、教育、弱势群体等相关热点时,这个群体非常希望以“在场”优势,发表第一手消息和意见。伴随着新社会阶层青年对本地文化的认同路径跃升,基于个体跨界合作、组织分化融合为主的小城镇的文化振兴,需要在互构共变中为新兴青年群体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同时要做好平台阵地的监督管理,激发其合作共生、共创共享的内生动力,依托其广泛的社会资源和智力资源。如尝试用动漫、文创、游戏等聚拢青年,在新圈层中丰富青年发展内涵,打造小城镇旅游新增长,把超时空的互动转变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传统产能转型升级和文化遗产的新动能,例如,邀请独立音乐人、乐手等参加小城镇音乐节。

## 五、研究结论

新社会阶层中的青年群体,作为“两个时代”叠加期的高速流动的新生代,其年龄结构、职业发展、角色转变、社会属性都处于过渡阶段,虽然是分散的个体,但其独特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小城镇的婚姻、交往、消费、社会参与等方面都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一方面,新社会阶层青年逃离大城市,定居小城镇隐喻着传统观念与城乡二元对立下的身份调适,流浪不仅是弥合空间流动与原始身份间张力的互相制约,更是以“新小镇人”的主体身份认同,去积极建构与小城镇振兴的互动性,进而转变为新的发展场域空间。青年的发展尤其是“逃离大城市”与“心中

诗与远方”的交织催生内心关于梦想与行为间鸿沟跨越的记忆与认知,远不止是物理距离与生活工作场景的生成与重叠。“乡愁记忆”的文化重塑,不仅蕴含着个人情感的交织与共鸣,也蕴含着城市与乡村、发展与守业、想象与实践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群体发生急剧变化,思想意识逐渐多元,了解新社会阶层青年的动态和思潮,吸纳其建议和意见,凝聚广泛共识,搭建符合其话语体系的发声、发展平台,从而助力和反哺小城镇振兴和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韩立红:《小城镇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 [2] 张琛 孔祥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思考》,载《理论探索》,2021年第1期。
- [3] 王素斋:《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内涵、目标与路径》,载《理论月刊》,2013年第4期。
- [4] 张登国:《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青年第一书记的行动范式》,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9期。
- [5] 张海东 杜平:《新社会阶层的生成机制及其再组织化问题》,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 [6]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http://www.zyztb.gov.cn/ztjw/350884.jhtml
- [7] 朱健刚:《新职业转正与新阶层青年的社会参与》,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35期。
- [8] 李强:《社会学视角中的新社会阶层》,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 [9] 徐鹏 周长城:《新时代背景下流动青年社会融入的结构测度与影响因素——基于2017年湖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9期。
- [10] 王成龙 武晓伟:《传统与变革:小镇返乡青年的文化与社会融入》,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1期。
- [11] 王道勋 陈延斌:《社会治理中青年参与能力提升研究》,载《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 [12] 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 [13] 何怡萱 刘昕:《青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基于2017年北京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载《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 [14] 谢素军:《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固化、自我和投机》,载《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20年第2期。
-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 [16] 马德坤:《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26日。
- [17] 张文汇:《现阶段我国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 [18] 赵菊 佐斌:《情境与互动:人际互倚及其模式》,载《心理科学进展》,2005年第6期。
- [19] 姜楠 闫玉荣:《场域转换与文化反哺:青年群体与变迁社会的信息互动》,载《当代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
- [20] Despres C. The Meaning of Home: Literature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1991, (2).
- [21] 王兆峰 廖红璐:《参照群体视角下社交圈对潜在旅游者旅游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载《旅游科学》,2018年第6期。

(责任编辑:刘彦)